

论吴越文化性征及其文化生成因素

——兼论“泰伯奔吴”与古梅里文化之形成

肖向东, 孙周年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无锡 214122)

[摘要] 中华文化是一个多元体系,“吴越文化”是这一母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区域文化,吴文化与越文化在今日地域文化研究中之所以备受关注,在于其对高速发展的“长三角”区域社会经济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文化支撑作用,这一文化如何生成?其文化历史渊源与文化性征是什么?二者之间有何联系?其文化走向与未来指向如何?此乃文章所重点研究与探讨的内容

[关键词] 吴越文化; 地域性征; 生成因素; 泰伯奔吴; 梅里文化; 开放融合

[中图分类号] G 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0)05-0066-05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uyue Culture and Its Cultural Generating Factors and an Accessory Discussion on the Exodus of the Prince Taibo from the Central China to the Ancient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the Rise of Ancient Meili Culture

XIANG Xiang-dong, SUN Zhou-nian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Chinese culture is a multiple system, in which the Wuyue Culture is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parental entity. As a regional culture, the reason why the Wuyue culture receives attention in the current study of regional cultures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plays a supporting role culturally which can not be underestimated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n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focus of the present article includes that the generating process of the Wuyue culture, it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origin and it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elements, and the future of it.

Key words: Wuyue Cultur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Generating Factors; Exodus of Taibo; Meili Culture; Open Integration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元文化构成的文化大国,在数千年的历史演绎中,大陆以及内河流域的文化生成环境,曾经孕育了众多具有不同本土特点的地域文化部落与原生态的生存群落,如黄河流域文化

群落、古代巴族文化群落、汉水与荆楚文化群落、古百越文化群落等,而诸种文化群落及其生命共同体又以自身的思想智慧培育出了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

[收稿日期] 2010-09-10

[作者简介] 肖向东(1958),男,湖南衡阳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西文学与文化比较研究。

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崧泽文化等,在中华文化五大谱系中,以黄河、长江流域而形成的人类早期文明,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要源流与精神主体,但两河流域的文明在长期的发展中,因地缘关系与地理阻隔,曾经一度沿着各自的轨迹平行延伸,创造着自身的辉煌却难以跨越交融,延至周代,这种文化僵局终于得以改变,这,就是史上著称的“泰伯奔吴”。

一、“泰伯奔吴”奠定古吴国先期文明的包孕性

据《史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1]123}对泰伯的义举,孔子赞曰:“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1]126}史上对泰伯的礼赞,多集中于泰伯在人格上表现出的“让”德与仁厚胸怀,揭示其不慕荣华权利、不畏困难艰险的创业精神,以及其体恤百姓、与民同济的民本精神,但从更深远的文化意义上观察,“泰伯奔吴”对于古吴国先期文明的建构以及其后吴国的发展,吴越文化的交流交融,乃至三国时期东吴雄霸江南,南宋时代东南形胜的形成,明清两朝江南商品经济与文化的繁盛以及今天以沪、苏、浙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与经济文化圈的规划,无疑有着重要的文化开基作用。

如前所述,中华文明以黄河、长江为摇篮,曾经创造了伟大的远古文明,奠定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基础。黄河文明创造的中原农耕文化,一度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生产工具,生产经验的积累,也大大提高了中原地区农业生产的能力与水平。而以“稻作文化”为基础的南方农业虽然暂为滞后,但先期的栽培技术已基本形成,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推助了这一文明的固化与延伸。诚然,以“稻作文化”为主体的南方文明的确大兴于后世,且在大范围开发与延展之后以“后来居上”之势超越了先进的北方,成为中国农业文明的重要表征,但我们如果追根溯源,细究这一文化的流脉,促成“黄河”与“长江”两河流域文明相互交融并竞相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无疑体现在“泰伯奔吴”这一伟大的历史与文化的迁移上。

泰伯“奔吴”与选择无锡梅里作为“入吴”的立足地,进而建立勾吴古国,距离我们今天似乎已十

分遥远,“古梅里文化”如何形成以及其“文化遗存”如何察辨,时至今日也是一个颇费思忖的学术问题。然而“泰伯入吴”在文化生成与“吴文化”之形成上,却有着明确的思想意义与文化指向:(一)“泰伯奔吴”开启了中国地域文化相互交融与文化流动的先河。发生学认为,文化的生成,的确与地理条件与地域生态的长期孕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地域文化的形成主要依赖的是地域性的生态环境与人文风习,但地域文化往往表现出一定的超稳定性、封闭性与排他性,因此,地域文化只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圈内发展,其自新的机制与速度呈现出某种“缓慢性”。地域文化的裂变与质变式的更新,只能依靠“外力”与“异质文化”因素,“泰伯奔吴”在文化意义上,显然为吴地文化的突变带来了新的文化因子与外在的文化冲击,尤其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稻作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与吴地自然条件与物产的结合,极大地促进了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农业文明的相互交融与深度结合,为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一种“流动”的基因,而生态环境上,其与南方“水文化”的“柔变性”相内应,自然也奠定了江南文化“随性应变”的文化机制。(二)“泰伯奔吴”奠定了古吴国先期文明的包孕性功能。古吴国形成之前,吴地固有的文明无疑以“水”为文化原点,进而与“水”结缘,以“水”为性,“水”,成为吴地文化的重要元素。“水”之特性,随物赋形,因时而变,而浩淼深阔的太湖又成为“包孕吴越”两地的“水世界”,“水文化”凝聚的灵魂与精神,遂成为吴、越两地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重要思想元素。“泰伯奔吴”带来的新型生产文化,一方面为吴地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另一方面,由泰伯在梅里建构起的古吴国先期文明与“梅里文化”也自然形成了自身重要的“包孕性”文化机制与功能,此为以后吴越两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三)“泰伯奔吴”初步形成了吴文化特有的开放机制与纳新意识。检索吴文化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的文化秘密,那就是吴文化自泰伯伊始,始终处在不断地纳新与变迁的运动状态。“泰伯奔吴”之后,古吴国先期文明的形成自不待说,其后,寿梦时代,“寿梦立而吴始益大”^{[1]123},“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1]123}之后,吴伐楚,楚伐吴,在以政治、军事为主体的碰撞中,形成一种特殊形式的历史文化交流,为后来吴国在夫差时代的鼎盛发展以及“吴越之争”打下基础,而以越王勾践为核

心、以由楚入越的外来人才范蠡、文种为骨干的“越灭吴”之战争,也进一步印证了吴、越文化的开放性。及至东汉末年以及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广纳豪杰贤才,雄霸江东;南宋时代知识精英偏安一隅,造成东南一带的社会繁荣;明清两朝江南商品经济与文化的繁盛等等。无不与吴、越两地以开放的文化气度善于接纳天下英才,吸纳外来先进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而论,“泰伯奔吴”,对于形成吴越文化特有的开放机制与纳新意识,在文化生成机制上,起到了重要的文化先导作用。其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意义,是颇为值得后人总结、反思与研究的。

二、“梅里文化”的潜在内蕴与吴越文化之性征

泰伯入吴,立足梅里,在建立勾吴古国、发展吴地农业经济的同时,文化上,亦以其人格魅力与无畏的探索精神,开启了具有江南地域特征的文化体系的建构。

从中国文化地图的演绎考论,吴越一带江南文化的形成,有着十分复杂的因素。地域上,吴越两地自古因环绕太湖而交流不断,往来频繁。文化上,古百越人作为江南的原住民,不仅创造了自身的历史,而且曾经一度将自身的文明传播至太湖流域,奠定了长江下游“稻作文化”的基础。至泰伯入吴,驻足梅里,在被称为“荆蛮”之地的吴地建立勾吴古国,发展起后来影响了整个江南的以“稻作文化”为主体的农业经济,这一漫长的历史演变,非本论所能述及。本文所侧重关注的是,由泰伯入吴,在梅里形成的古吴文化的初始形态与后来吴越文化在广泛而深度的交流过程中所以建构起的具有共同文化性征的新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不仅因源出泰伯与梅里而引人注目,更因其文化生成因素的内在性与同一性而别具探讨意义。

1. “让”德文化的潜滋润养与吴越文化“柔性”精神的培育。

文化源流上,吴、越文化因地缘关系而同出一脉,从长江下游地区浙江余姚一带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到之后嘉兴的马家浜文化和上海青浦的崧泽文化,再到浙江余杭的良渚文化,沿着这样一条长江下游早期原住民文化演变的路线与轨迹,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缘钱塘江与长江夹角地带的太湖周边地区的吴、越先人很早就开始了重要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4000年左右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时

期,吴、越两地长期处于胶着形态,其文化交流的区域大面积地分布于太湖地区,范围包括浙江北部、今上海市、江苏东南部区域。“现已发掘的主要遗址除马家浜文化外,还有浙江吴兴邱城、桐乡罗家角、江苏吴江梅埭袁家埭、吴县草鞋山、张陵山、苏州越城、常州圩墩、武进潘家墩、寺墩和上海青浦崧泽等。”^[2]至泰伯入吴,太湖周边的吴越文化事实上已有互为一体、不分伯仲之势。而泰伯入吴,则将先进的中原文化率先传入吴地,并通过太湖的辐射传播功能,向其周边流域的吴越故地浸润渗透。

文化建构上,“泰伯奔吴”本身体现的“让”德与宽仁敦厚的人文性格,对于吴越两地的先民崇尚仁义、培育明礼谦让的人文风尚,具有明显的道德教化作用与潜在的思想影响。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涉及中国的南北情貌与人文性格,一般认为,北人主刚,南人性柔。但南北人文风习的演变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其间所经历的世变的曲曲折折以及反映出的文化因素,远非一般论述所能说明,但“泰伯奔吴”却是我们观察南北流风“时变”的一个“透视点”。泰伯入吴之前,所接受与代表的显然是以中原文化为特征的“北方”文化,北人虽因地域、地理因素培育了刚健质朴、率真耿直的秉性,但其后中原文化亦孕育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仁义”道德与崇尚“礼义”之风。“泰伯奔吴”,自然将中原早期先进的文化因子带入南地,由“吴”传“越”,在长江下游形成“北—南”文化的一个交流区,并逐步影响了古代吴、越两地文化的建构,故,对泰伯礼让天下、德泽子民的义举,春秋末期的孔子赞曰: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让”,成为“吴”以及“越”文化“柔性”精神的一个重要形式表现。“让”,内含了“理性”与“感性”两种表达形式,从理性的角度说,“让”是一种“礼义”,一种节制;从感性的方面理解,“让”,是一种情感,一种操守。“礼让”、“谦恭”,就是后来孔子所崇尚的“礼”、“义”、“仁”、“爱”,是人类的一种大德。长期以来,古代的吴地被称为文明未开的“荆蛮之地”,古百越人也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自在状态,泰伯入吴,显然为吴、越两地带来全新的文化与文明,中原文化所内含的北方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中原文化的人才及学术和思想观念,中原人文的性格精神,始得注入吴越古地,使之开始了从一个落后、偏僻且一直保持自身原始内涵的地方民族文化向先进的文化共同体中同构的区域性文化的根本性转变。而以“让”德文化为核心形成的文化理念的潜滋润养也逐步培育起了吴、越文

化中特有的“柔性”精神与崇尚“礼义”的社会风尚。

2. “水”的生态性征与吴越人“求新”、“求异”意识的形成

吴、越两地有着丰富的“水资源”。地处长江下游以及地势的低洼起伏,使吴越两地河网密布、湖河交融。“水”既是吴越人拥有的自然生态环境,又是吴越两地的生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千百年来‘水’的浸润以及天长地久地游弋在清新柔雅的太湖之上,沐浴着‘包孕吴越’的太湖的云光雾影,大自然赋予吴人‘秀外而慧中’的文化秉性与外柔内刚的人格精神。”^[3]也正是这种秀外慧中的文化秉性与刚柔并济的人文血液的渗透,以及“水文化”特有的因时而变、随物赋形的特点,培育了吴越人一种不断探索、一往无前、求新求变、变革创新的文化意识与创造精神。老子曰:“上善若水”。吴越人长期与水为邻,以水为邦,生活与文化的生态化取向,无疑使之深谙“水”之内蕴与灵性,尽得“水”的哲学启迪与思想妙悟,因此,吴越两地的人文环境与社会风尚,相对于内陆以“山地”与“平原”为平衡生态的超稳定的社会格局,自然就多了一分“灵动”与“机变”,历数“泰伯奔吴”之后吴、越两地社会生活与历史的演变,我们可明晰地看到吴越大地所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如寿梦时代接受楚国强兵之策“用兵乘车”,遂使吴“益大”。王僚时代,公子光接纳楚之亡臣伍子胥,至阖庐时期,任用晋国军事天才孙武,一时间使吴国成为东南强国。而越国此时则引用了楚国的文种、范蠡等杰出人才,终至完成了灭吴兴越的大业。像“水”纳千流一样,不分亲疏,无论内外,广纳贤才,惟能是举,显然是“泰伯奔吴”之后,在吴越两地形成的一个传统,一批批贤能在历史的滚动与发展中不断聚集于吴越两地,一方面推助了吴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强化了吴越人“求新”、“求异”的创造意识,进一步建构了吴越集纳天下英才、不断进取创新的优秀传统。

3. “嬗变”“融合”之气与吴越文化崇尚“和谐”“大气”之境的追求

吴越文化形成的开放意识与吴越文化长期的相互交流,亦为吴越人的精神气质带来了“嬗变”、“融合”的文化特性,此同样与“水”的柔而能变、大而能融的物质属性相吻合。“嬗变”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世界文化谱系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化之所以消失,而中国文化之所以历五千年弥久弥新,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中华文化的宏大气度与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的“嬗

变性”文化机制。“融合”是中国文化善于吸收“异质”文化因子以及不断改造异源文化进而将之变为自身进步的有机元素的一种“同化”机制,从中华文化历经五千年长盛不衰,且不断自新壮大的行进历程来看,融合新机,吐故更新,在同化中蕴含机变,在善变中求得和谐,守本开新,生生不易,是中国文化始终葆有青春活力的一种内在机制。吴越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具有善于吸收“异质”文化的一种不断“自新”的文化,在秉承中国文化“嬗变”、“融合”的精神气质上,自“泰伯奔吴”之后,始终处于一种领先的地位。秦汉以前不提,就东汉以降而论,东吴孙权集团政治、经济、军事的强大,南北朝时期南朝佛教文化的繁盛,隋唐时代由运河带来的江南的富华,南宋之后因偏安一隅造就的富甲一方,明清两朝商业文化的萌生而诱发的经济繁荣,以及近代以后因资本与现代工业的引入带来的民族工商业的兴起,无不以历史事实证明着吴越文化在其开放意识与“嬗变”、“融合”的精神气质指导下形成的文化机制在吴越两地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主导性作用,而无论“嬗变”或“融合”,所追求的目标,一是整合性的“和谐”,二是融合式的“壮大”,此即是中国文化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天人合一,有容乃大!

三、“古梅里文化”精神与无锡新区文化的契合

如前,“泰伯奔吴”不仅缔造了勾吴古国,同时创造形成了“古梅里文化”。

“梅里古都”,作为吴文化的象征,千百年来,始终以她的历史与文化遗存述说自己的故事,传递着古吴文化的信息,尤其是那些今天仍留存于世的庙宇、陵墓、塑像、园林、石雕、碑刻、沟渎,以及在梅里人的民间风习与俚俗中寓含的古吴文化的因子,在大量的文化典籍中隐藏的神秘而真实的故事与人物,以及丰富的民间轶闻与历史传说,都可以触摸到古吴文化的沧桑记忆,萌发千古幽思,万载情怀。古都今日的每一下脉跳,都牵动着她的历史心脏,而今天地处“梅里古都”这片文化厚土之上的无锡高新技术经济区,在文化精神上,亦与“梅里古都”一脉相承,息息相通,同时又以新世纪的文化风貌引领着吴越文化的潮头。

1. “古梅里文化”的吸纳精神与无锡新区开放气度的精神契合。

“梅里”之所以成为吴文化的发源地,在于当年“泰伯入吴”所带来的中原先进文化的融入以及在

梅里古都形成的大胆吸纳异质文化的精神气度,而今天在无锡新区所形成的新加坡工业园区、国际生活社区、与国内外具有广泛联系的航空港产业园区、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以及以“海力士”为代表的世界 500 强的 60 多家大型企业的入住, 1500 多个外资项目的引入, 337 家“530”创新创业企业的落户等等,显然是当年“古梅里文化”青春在新时代的焕发,“梅里文化”的核心,在于它的“开放性”与“建构性”,今日,无锡高新技术经济新区的建设与发展,所坚持的就是“开放性”与“建构性”的原则,在开放的基础上发展,在建构的基础上开拓,在发展的基础上创新,构成了新区文化在新世纪的新特点,但又明显地与“古梅里文化”表现出内在的契合性。由此可见,文化的承传,既有外在的可见性的传统征象,又有其内在的精神的契约,内外的作用,决定着文化的流向与生命强力,“古梅里文化”精神犹如流动的血液,始终滋润与支持着吴地以及新区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催生“新”的诞生与未来的创造。

2. “古梅里文化”的开拓精神与无锡新区创业文化的深度融合

当年勾吴古国在梅里的建立,其历史意义显然在于它的开拓性,并由此开始了吴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漫长的历史进程,而“古梅里文化”的首要意义,就在于泰伯带领梅里人民在“荆蛮”之地开垦出了一片全新的文化沃土。不畏艰辛、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开拓精神,构成了“古梅里文化”的精神灵魂。这种精神在今天的新区建设中所起到的文化支撑与引领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新区作为今日中国“长三角经济区”的一个重要示范与引领性创业基地,其“文化旗帜”上所书写的大字就是“创业”!一切“创业”都源于原始开拓,意味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这与当年泰伯由中原富庶之地来到蛮荒的太湖之滨“白手起家”在实质上并无区别,由此而论,“古梅里文化”的开拓精神与今日无锡新区所倡导的创业文化在新世纪表现出一种深度融合,老子曰:“柔弱者生之徒”、^{[4]85}“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4]44}一切强大都起于“微小”、“低下”与“柔弱”,事物总是沿着相反相成的逻辑演

变方式而运行,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创业的思想逻辑。“古梅里文化”的开拓精神与无锡新区创业文化所表现出的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展路径,即鲜明地证明了这样一个历史与文化逻辑。

3. “古梅里文化”的进取精神与无锡新区科学发展的起承转合

“古梅里文化”由于特具一种善于吸纳外来文化、异质文化同时建构起自身特有的外向视野与开放体系的文化性征,亦决定了这种文化范型所具有的“兼容性”与“崇尚多元”的文化取向,而不同文化在同一空间的相互碰撞与激励,杂交与融合,同时又与本土文化产生深度融合,必然会生成一种新型文化,这种文化既保留着本土文化的特质,又杂糅了多元文化因素,而以一种全新的形态呈现出来,故,“古梅里文化”这种文化进取精神在今天无锡新区的文化建设中也依然发挥着灵魂性的引导作用。当今的“长三角地区”已被国务院正式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落与经济圈”,作为与世界同步的经济区,经济、贸易、交通的立体化发展将有赖于文化的支持,“梅里文化”以及“吴越文化”所特具的外向、开放、多元、进取的文化精神必然成为这一区域二次创业与快速发展的重要内驱力与思想元素,尤其是在倡导“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如何发扬“古梅里文化”文化精神,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增强新区人的创业意识、进取意识、拼搏意识、创新意识,创造新区辉煌的明天,这将是新区沿着“古梅里”的文化路径继续开拓前行的一个新课题。相信经过科学发展的起承转合,“古梅里文化”必将焕发新的青春,成就今日新区的理想与伟业,在梅里故地创造出灿烂的未来!

综观中国文化地图,自西周至今,经由了一条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文化路线,这条路线一步步将中国民族引向进步,引向现代,引向世界,今天的新区在国家发展“世界第六大城市圈”的规划中因地处“长三角”的中心区,将成为中国与世界接轨和中国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多元的文化必将再一次在这里交流、碰撞,多种文化因素也必将再一次为“古梅里文化”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使之成为中国地域文化的一朵奇葩!

[参 考 文 献]

- [1] 司马迁. 史记:卷三十·吴大伯世家[M].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
- [2] 李学勤,徐吉军. 长江文化史[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9.
- [3] 肖向东. 吴文化发展研究[M]//王立人. 2005年无锡市经济社会报告书.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39.
- [4] 本丛书编写组. 老子·大学·中庸[M].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闫卫平)